

# 文化史视野下的五四新文化运动

孟凡明,花琦

(六盘水师范学院 历史与社会文化科学系,贵州 六盘水 553004)

**[摘要]** 革命史范式下的五四新文化运动,过多强调激进与革命的一面,导致有很多问题值得重新审视,诸如对白话文和全盘西化的认知。白话文固然有简易通俗等优点,瑕不掩瑜,但其弊端也不容忽视,文言的高雅与形式的完美,白话文与之相去甚远。固有的认知指责新文化运动是“全盘西化”,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彻底扬弃,其实也并非如此。中国文化将走向何方,必将是多元并存,中西交流,古今传承。

**[关键词]** 五四新文化运动;白话文;全盘西化

**[中图分类号]** K261.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117X(2013)04-0130-04

## On the May Fourth New Culture Movement in the View of Cultur History

MENG Fanming, HUA Qi

(Department of History and Social Culture, Liupanshui Normal College, Liupanshui, Gui Zhou 553004 China)

**Abstract:** The May Fourth New Culture Movement under revolutionary history paradigm laid too much emphasis on its radical and revolutionary nature, thus caused many problems that need our re-examination, such as the recognition of vernacular Chinese and overall westernization. Though the vernacular Chinese is simple and popular, its disadvantages cannot be ignored. Classical Chinese is elegant in language and perfect in form, while the vernacular Chinese is far from this. The inherent recognition criticized that the new culture movement was an overall westernization and complete sublation of China's traditional culture, but it was not the case. Chinese culture will be diversified and coexist with other cultures, inherit the ancient and present and exchange between the East and West.

**Key words:** May Fourth New Culture Movement; vernacular Chinese; overall westernization

“五四”作为一个中国青年的节日最早是在1939年3月,陕甘宁边区青年联合会建议以5月4日为青年节,这个提议被全国其他许多组织及国民政府所接受。后来,国民党惧怕青年革命,1944年则以3月29日(1911年广州黄花岗革命烈士纪念日)为青年节。新中国成立后,1949年12月正式宣布五月四日为中国青年节。<sup>[1]</sup>“五四”作为一种象征符号为我们所铭记,但是,还有很多问题值得

我们去重新审视。

### 一 白话文运动的弊端

一般认为中国近代的白话文运动发端于五四新文化运动,其实不然。

可能最早呼吁使用白话文的是黄遵宪,1887年他就提出了“崇白话而废文言”的口号,主张使旧文体“适用于今,通行于俗”“欲令天下之农工商贾妇

收稿日期: 2013-06-06

作者简介: 孟凡明(1977-),男,湖北襄阳人,六盘水师范学院讲师,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史研究;花琦(1981-),女,江苏大丰人,六盘水师范学院讲师,主要从事世界史研究。

女幼稚,嘴能通文字之用。”其目的显而易见。因为面对民族危机,要开启民智、普及教育,就必须寻求最简易的文字、最通俗的语言进行思想启蒙,白话文运动由此而兴。

揭开五四时期“白话文”运动序幕的,学界一般认为是胡适在《文学改良刍议》(1917年1月1日《新青年》第2卷第5期)中提出的“八事”主张,即:言之有物、不摹仿古人、讲求文法、不作无病之呻吟、务去滥调套语、不用典、不讲对仗、不避俗字俗语。他提倡以白话文代替文言文,以白话文学代替仿古文学。产生广泛影响的还有陈独秀发表的《文学革命论》,提出文学革命三大主义:“推到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推到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推到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

开拓中国新文学道路的是鲁迅发表的中国第一部现代白话文小说《狂人日记》(1918年5月15日《新青年》第4卷第5号),对吃人的封建礼教进行无情控诉和鞭挞,树立了把文学革命的形式和内容相结合的典范。

以上三例都是人们津津乐道的白话文的功绩。起初,对白话文的讨论,《新青年》杂志较为热闹,傅斯年、陈独秀、朱经农、钱玄同、刘半农、鲁迅等人全都卷入其中,但是在整个社会上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推动白话文运动进一步发展的则是钱玄同和刘半农。钱玄同发表《论注音字母》(1918年5月《新青年》第4卷第1号)一文,标志着“白话文运动进入实质性的建树阶段。”<sup>[2]</sup>新式标点符号在全国通用则是在1920年春由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颁布的法令。在文学史上,引为美谈的则是钱玄同和刘半农二人合演的“双簧戏”。钱玄同假借“王敬轩”之名,公开发表致《新青年》的信,大骂文学革命;再由刘半农予以驳斥。后果自然是在读者中掀起轩然大波,对白话文的讨论规模日益扩大,白话文的影响超越了文言文。最终,在1920年秋季,所有国民小学一、二年级的教材全部采用白话文。似乎白话文也取得了最终的胜利。但是,白话文运动的弊端是的不容忽视,而我们的中学和大学教材

很少讲到白话文运动的弊端。

最容易感知的是古诗词的神韵在现代白话文中只有“平”“白”之美,以胡适的题为《朋友》的白话小诗为例,“两个黄蝴蝶,双双飞上天。不知为什么,一个忽飞还。剩下那一个,孤单怪可怜。也无心上天,天上太孤单。”故张中行先生说:“白话文句子长了,而且常常是字数多少不等,想押韵就比较难,所以文言各体的押韵花样,唐宋以来,只见于文白夹杂的曲和弹词等作品里,到现代语的作品里就差不多绝迹了。”<sup>[3]</sup>白话文不可能兼具文言晶莹、凝练的审美效果。“不必引经据典,我们就可以断定,中国的文言是最美最考究的一种语言文体。它有精密的文法、严格的规范,优美的音韵和高雅的意象。文言在追求形式的完美上,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sup>[4]</sup>这一点,白话文与之相去甚远。

鲁迅先生也说过:“白话要压韵而又自然,是颇不容易的。”<sup>[5]</sup>周作人在《扬鞭集·序》(1926年5月《语丝》第82期)一文中则批评白话文作品:“一切作品都像是一个玻璃球,晶莹透澈得太厉害了,没有一点朦胧,因此也似乎缺少一种余香与回味。”

也许最糟糕的是去汉字化,无异于自毁长城。汉字是中华民族文化的根,汉语体系的欧化,将会导致中国传统价值的崩溃,造成文化认同上的困境。1944年,吕叔湘先生在《文言与白话》一文中严重警告:“文言和白话是互相对峙的两个名词:在早先,没有白话,也就无所谓文言;将来要是有一天,文言不再在一般社会里头通行,白话这个名称大概也要跟着消灭。”让我们以海德格尔的话共勉:“语言是一种人对世界的观念……是对人的整体历史精神的全面的,并有其特性的表现。”<sup>[6]</sup>语言符号是一个民族的象征,符号的遗失意味着民族文化和民族地位的遗失。

## 二 不存在实质上的“全盘西化”论

先前固有的认知是指责新文化运动是对中国传统文化否定,走的是一条“全盘西化”的道路。这其实又是一种误解。陈旭麓先生认为这样做是“批判的激情多于批判的理性。”<sup>[7]</sup>

一般认为陈独秀和胡适是“全盘西化”论的代

表人物,例如,陈独秀讲道:“若是决计革新,一切都应该采用西洋的新法子,不必拿什么国粹、什么国情的鬼话来捣乱。”<sup>[8]</sup>于是,我们所能记忆的新文化运动,除了非理性和“全盘西化”这种弊端外,还有什么?其实,如果实事求是地归纳和总结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性质和负面影响的话,不妨采用学者耿云志的观点:激进主义、泛政治化和迷信群众的运动。<sup>[9]</sup>

胡适是新文化运动的健将,积极鼓吹和传播西方文明,“全盘西化”一词,最早也是由其在1929年提出,当年他在《中国基督教年鉴》上发表《中国今日的文化冲突》,主张“全盘的西化,一心一意走世界的路。”于是,胡适被冠之为“全盘西化”论的始作俑者。<sup>[10]</sup>

胡适“全盘西化”代表性的言论是:“此时没有别的路可走,只有努力全盘接受这个新世界的文明,全盘接受了,旧文化的惰性自然会使他成为一个折衷调和的中国本位文化。我们不妨拼命走极端,文化的惰性自然会把我们拖向折衷调和上去。”<sup>[11]</sup>

陈独秀和胡适是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其言论代表新文化运动的舆论导向,于是,新文化运动主张“全盘西化”论的结论水到渠成。

然而,“全盘西化”论更为激进的代表是岭南大学陈序经教授,他于1933年底在中山大学演讲《中国文化之出路》,由此揭开中国20世纪30年代“中国本位文化”论和“全盘西化”论的文化大论战。他在同名著作《中国文化之出路》一书中说道:中国文化是一个整体,“文化本身是分不开的,它所表现出的各方面都有连带及密切的关系,它并不像一间房子,屋顶坏了,可以购买新瓦来补好。所以我们要格外努力去采纳西洋文化,诚心诚意地全盘接受它,因为它本身是一种系统,而它的趋势是全部的而非部分的。”<sup>[12]</sup>陈序经认为欧洲近代文明比我们进步的多,西洋现代文明是世界发展趋势,中国传统文化已经不能适应现代生活,故应改弦更辙。

但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全盘西化”并不是历史的真实面目。胡适的“全盘西化”只是一种策略,即“取法乎上,仅得其中”的改造中国旧文

化的策略,目的是要创建一个中国本位的“新文化”;不论是“全盘西化”,还是“全力现代化”“充分世界化”,其内涵都是科学化、技术化、民主化,这实际上是胡适朦胧的现代化思想。<sup>[13]</sup>大量新的研究成果也已经澄清五四新文化运动并非“全盘西化”。

### 三 中国文化的走向

中国文化与盛极而衰的古埃及、古巴比伦、古希腊、古罗马文明相比,最大特点就是其特有的延续性。因此,黑格尔称赞只有中华帝国才是世界上唯一具有持久文明的国家。但是,到了现代,到了五四时期,中国文化却发生了断裂,中国文化发生了真正意义上的革命。激进主义与保守主义的争执,各自偏激一端,以绝对排他性的态度否定对方的一切。

通常认为中国文化曾经长期领先于世界,只是在世界进入近代以后,由于守旧派抱残守缺和封闭自守,才落后于西方科技文明。于是在自卑心理下盲目学习西方,“从而在接受西方文明时显得非常肤浅,西方文明中真正有精神价值的重要资源没有接受,只是拿来最容易消化、最见效而最不深刻的东西。”<sup>[14]</sup><sup>431</sup>历史的洪流滚滚向前,以摧朽拉枯之势扫荡中国传统文化,我们总是习惯于看到得到了什么,而很少反思失去了什么。

儒学传统的断裂始于“五四”。正是“五四”激进主义造成了“文化中国”资源的衰竭和价值的跌落。儒家传统,既是历史遗存,也可为现实摄取。儒学是一个复杂的思想体系,既包括积极的价值,也包括消极的思想成份。有人提出“儒学复兴”问题,更有人喊出“21世纪是儒学的世纪”“21世纪必将在全世界复兴儒学”等口号。杜维明教授明确表示不赞成“儒学复兴”的提法。因为“儒学复兴”是一厢情愿的、没有经过反思而且绝对不可能有真正创见的一种提法。<sup>[14]</sup><sup>434-435</sup>“中国文化再博大精深,儒家学说再高明玄妙,中国模式再快速高效,也别指望能取别人已有的信仰、文化、观念、模式而代之。”<sup>[15]</sup>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会长费孝通先生多次讲到“文化自觉”问题,提出不同文化的相处之道: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在民族

关系的处理上要尊重“多元一体格局”,在全球化过程中的“文化自觉”,实行和确立“和而不同”的文化关系。<sup>[16]</sup>

传统与现代并非水火不容,“西方现代化理论直到20世纪六七十年代,才认识到传统与现代在现实生活中并不是截然分离的,更不是只存在对抗。传统不论在空间和时间因素上都存在极大的特殊性和多样性。任何一个民族都是传统与现代并存的,任何一个民族也都是在传统与现代的新陈代谢过程中前进的。”<sup>[17]</sup>真正的“文化中国”必然是传统精华与现代文明的有机融合。中国文化的最终走向必然是多元并存,不断开放、包容、创新,中西文化交融,古今文明传承。

五四新文化运动以高昂的姿态,恢弘的气度,气贯长虹的气势猛烈冲击中国的传统文化,被广泛赞誉为中国的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冷静之后,审视过去,“历史是动态的和鲜活的,并不是僵硬的和死寂的。在实际教学中,我们要具备批判性思维的教学观,超越教材,树立以下观念:一、知识不是固化的,而是可以质疑的;二、材料不是不变的,而是可以补充的;三、结论不是唯一的,而是可以多元的。”<sup>[18]</sup>展望未来,我们将会以更加睿智的眼光,更加理性的思维和更加宽容的心态去继承和创新光辉灿烂的中国文化,使其在世界文明中更加璀璨夺目。

#### 参考文献:

- [1] 毛泽东选集: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7:533.
- [2] 马以鑫.“白话文运动”历史轨迹的重新考察[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2):77-84.
- [3] 张中行作品集:1卷[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81.
- [4] 杜素娟.关于白话文运动的几点追问与思索[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7(4):27-39.
- [5] 鲁迅.鲁迅全集:12卷[M].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556.
- [6] 马丁·海德格尔.在通向语言的途中[M].孙周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118.
- [7] 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391.
- [8] 陈独秀.今日中国之政治问题[J].新青年,1918,5(1):3.
- [9] 耿云志.关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几个问题[J].社会科学战线,2009(10):218-229.
- [10] 周溯源.“全盘西化”论的始作俑者[N].人民日报:海外版,1987-03-04(2).
- [11] 胡适.编辑后记[J].独立评论,1935(142):24-24.
- [12] 陈序经.中国文化的出路[M].北京:商务印书馆,1934:82.
- [13] 刘亚桥.“全盘西化”、“充分世界化”与“现代化”——胡适“全盘西化”之真义[J].甘肃社会科学,2000(2):37-39.
- [14] 杜维明文集:5卷[M].郭齐勇,郑文龙,编.武汉:武汉出版社,2002.
- [15] 葛剑雄.对“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几点思考[J].国际展望,2012(3):3-3.
- [16] 费孝通.百年中国社会变迁与全球化过程中的“文化自觉”——在“21世纪人类生存与发展国际人类学学术研讨会”上的讲话[J].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4):5-11.
- [17] 姚伟钧,李勤合.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文化走向[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3(1):75-80.
- [18] 田苹,孟凡明.有关“五四运动”的教学资料研究[J].历史教学:中学版,2011(7):58-63.

责任编辑:骆晓会